

Financing life

从特蕾莎修女看慈善之道



1979年12月12日,挪威奥斯陆,特蕾莎修女获诺贝尔奖



刘军宁, 安徽人, 1961年生, 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军宁

孔子:您知道,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均富。孙文曾把我的这一理想写进了他的三民主义。当时我甚为高兴了一阵,可后来的下文却越来越少了。虽然现在中国大地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他们还用什么基尼系数来说明,我也闹不明白。可是,即便在儒门,主张均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过,我最近读到了一些关于印度修女特蕾莎的事迹。我从这位修女身上看到了均富的希望。您不是也认为真正的天道也应该“损有余以补不足”吗?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好不好?

老子:这当然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不过,我可不敢主张均富,尤其反对由政府靠强力来实现均富。特蕾莎修女的事我也读到一些。我对她也是非常钦佩。从她身上可以印证我们已经发现的天道。财富的分配是个大话题。我理解,特蕾莎修女的故事,更多是慈善。我们今天不妨聊聊慈善的事。

孔子:这样也好。其实,慈善就具有某种财富再分配的功。慈善事业越发达,当然,我的均富理想就越有希望。我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遇上炒股的老板

◎文/曾繁利 图/许青天

公司很久没给我们加薪了。要是过去,恐怕早就闹翻了天。可自从同事小马炒股一夜之间就几乎赚了大家十年的工资后,大家都疯狂地迷上了炒股,谁也不在乎那几百元的新薪水。就连平时面无表情老板,也放下架子和我们探讨起炒股之道来了。大家对股票的热情一度超过了工作,致使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明显下滑。

然而,炒股并不等于赚钱。由于大家对股票期望太高而盲目地投入,加上股市风险变幻莫测,一段时间下来,公司里已是一片唉声叹气,基本上没人赚到钱,不少同事还赔进去上万元,众人后悔莫及。

冷静下来以后,大家终于明白,靠炒股发财是很难的。于是又把心思放到了工作上,决定先做好了工作再要



求老板加薪。经过大家的努力,公司的业绩有了明显的回升,可到了月底连平时该给的奖金都没了。大家觉得是该找老板要求加薪的时候了。

当老板听到我们要求加薪时,却兴奋地说道:“加薪绝对没问题,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工资一直没涨,就连这

这样的幸福能有多甜?慈善不论多么崇高,只能是道德上的一个补充手段。人的生存不能寄希望于慈善。正像诺贝尔奖委员会所说,特蕾莎修女的事业不仅在于帮助穷人,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于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孔子:听您这样解释,慈善背后还有很大的道理。能否再多说一些?

老子:的确,慈善不是仅仅做些好事,帮助穷人。慈善也不是个孤立的社

会现象。慈善还有两个隐秘的前提:一个前提是私有财产权。慈善需要把慈善物品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捐赠者必须对所捐赠的物品有毫无争议的所有权,不能是盗抢来的赃物或公共物品。所以,私有财产权和私有制是慈善的前提。慷其他纳税人之慨的行动不能叫慈善。没有赚钱的自由和对财产权的保障,就没有自发且大量的慈善。

另一个前提是自愿。慈善是基于自愿的。慈善行为中,捐赠与收受双方必须是自愿的。强迫出钱出财,非抢即盗;强迫接受捐赠则是侮辱人格——慈善不能降低个人自立与个人自尊,如果慈善带来的不是自由与尊严而是依附与奴役,那么慈善就是毒药。

孔子:听您这样说,我的确对慈善有了新的认识。那么,慈善的发达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

老子:问得好。我觉得慈善离不开自由,尤其离不开信仰的自由与结社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就没有行善的强大内在动力。没有结社自由,就没有把善意转化为行动并持续下去的慈善组织。如果没有信仰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特蕾莎修女就没有立足之地和行善的可能。如果自由筹款和自由捐赠被认为是扰乱金融秩序,就没有人给特蕾莎修女捐钱。只有在自由之下,慈善之举才能大量涌现,同样,在自由之下,对慈善的需求才会大大减少。对慈善的需求越少,慈善的义举反而越多。对慈善需求最多最迫切的地方,慈善往往反而最少。谁听说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有慈善家或慈善组织活动的迹象?不是饥民不需要慈善,而是不允许慈善,没有慈善的前提。对民间慈善的限制越多,慈善的举动就越少;越富的国家慈善越多,越穷的国家慈善越少;绝对的贫困,绝对没有慈善事业。可见,慈善是自由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孔子:难得一个一贫如洗的特蕾莎为穷人做了那么多的事。那些富人那么有钱,其所做的根本不足以与特蕾莎相比,这不正说明为富不仁吗?至少,中国的富人中肯为慈善花钱的人少之又少。

老子: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中也有对富人的偏见。中国的富人慈善家的确少得可怜。可是,中国的穷人中也未见有特蕾莎式的人物。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如此不发达,责任不在穷人在富人。中国人也未见得不慷慨。你瞧瞧那送红包、送礼物和饭后争相结账的场面。问题是慷慨不能转化成慈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在政策和制度上。与其说中国人的善心不够或道德素质低下,倒不如说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鼓励人们向善的社会环境。慈善的行为不仅不带来掌声,反而受到许多的限制和刁难,甚至无端的猜忌,甚至阶级的分析。中国并不缺乏慈善家,只是他们在通向慈善的道路上还有重重的障碍,他们还不能自由地成立慈善机构,没有顾虑地策划

慈善行动,自动地享受因捐赠而得到减税。在中国,在谴责富人之前,要想给富人多少行善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鼓励慈善的法律和制度的平台,如果捐款的去向总是不明,谁又会乐意继续捐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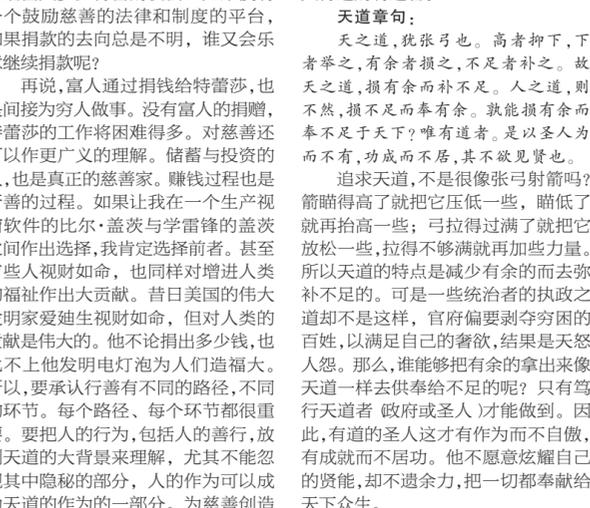
再说,富人通过捐款给特蕾莎,也是间接为穷人做事。没有富人的捐赠,特蕾莎的工作将困难得多。对慈善还可以作更广义的理解。储蓄与投资的人,也是真正的慈善家。赚钱过程也是行善的过程。如果让我在一个生产视窗软件的比尔·盖茨与学雷锋的盖茨之间作出选择,我肯定选择前者。甚至有些人视财如命,也同样对增进人类的福祉作出大贡献。昔日美国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视财如命,但对人类的贡献是伟大的。他不论捐出多少钱,也比不上他发明电灯泡为人们造福。所以,要承认行善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环节。每个路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要把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善行,放到天道的大背景来理解,尤其不能忽视其中隐秘的部分,人的作为可以成为天道的作为的一部分。为慈善创造

条件,就是为天道之行创造条件。特蕾莎修女为众生作奉献,她就是一种助天行道的有道者。

天道章句:
天之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损有余而奉不足于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见贤也。

追求天道,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箭瞄得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瞄低了就再抬高一些;弓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够满就再加些力量。所以天道的特点是减少有余的而去弥补不足的。可是是一些统治者的执政之道却不是这样,官府偏要剥夺穷困的百姓,以满足自己的奢侈,结果是天怒人怨。那么,谁能够把有余的拿出来像天道一样去供奉给不足的呢?只有笃行天道者 政府或圣人 才能做到。因此,有道的圣人这才作为而不自傲,有成就不居功。他不愿意炫耀自己的贤能,却不遗余力,把一切都奉献给天下众生。

漆皮剥落的财富故事



◎王志成

再叙乔致庸。夹于太行、吕梁之间的河谷平原上,突兀一座围城也似的乔家大院。高墙深宅内,到处悬挂对联匾额,俨然书香门第。至于挂遍大小院子的大红灯笼,完全是受张艺谋电影的误导。内涵严谨的治家格言与象征晦暗的红灯笼们互为映照,也不怕引发游客的不良联想。乾隆年间,乔氏先人于包头发迹,取号“复盛公”。民间流传起“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口号。清末民初,至乔致庸一辈,金融资本在一千两白银以上。晋地的钱庄票号,大多姓乔。据统计,向民间人士乔老舍借过钱的朝廷大官有李鸿章、左宗棠等,北京闻八国联军,慈禧太后避难时,也曾在院中留宿。至今大门上悬挂的“福种琅环”的一块横匾,据说还是老佛爷赏的。

两位财主轰轰烈烈的致富之路虽有不同,但在甘冒风险、赚钱之后盖大房子、使银子巴结官府等经营策略上颇多共识,完全符合封建时代的国情。

滑稽的是,圆圆的历史车轮转了一大圈儿,再将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旧货色拾起,吹吹掸掸地涂上新漆后隆重面世,既具尊重历史的传统美德,又显示出尊金情绪也可喜可嘉,只见游客蜂拥而至,带着一脸的崇敬之情,瞻仰财主们的发家圣地,念诵刻在门柱上的家训语录,听那些掺了水的赚钱事迹……

只有不谙世事的孩子追问,他为什么会发财?后来呢!

后来呀,明代大款沈万三因抢着发军饷而激怒圣上,差点儿被砍掉脑袋。经厚道的马皇后斡旋,减罪发配云南充军。其时,滇地雾瘴蛮荒,尚无今天“世博会”的繁华景致。沈财主的身子娇贵,耐不住委屈,不久呜呼哀哉。而山西的乔家富到极致,便开始刹不住车地朝下溜。待抗战期间,家人为了躲鬼子,终作鸟兽散。当地老百姓说,自那时再无人回来,空剩了座大宅子权当道具,任导游小姐的小嘴儿编排些漆皮剥落的财富故事。

我特别注意到,每每言及落幕部分,两地的解说员皆淡淡几语带过;至于当时沈万三与乔致庸为什么会致富的财商动力与落幕的财商失算,尽被藏掖在钱柜子底下,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张晓晖

石油逼近100美元了,中国股市跌破5000点了,美国股市创新低了,次级债的连环雷响了,花旗和汇丰都换领导了。市场就是这样,一下子就能从阳光灿烂到乌云压城,流动性一下子就从泛滥到黑洞,再这么折腾一个月,股市能从“车如流水马如龙”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

如果在太阳底下竖一根竹竿,早上和黄昏的影子是最长的,中午的影子最短。太阳绕着地球转呀转,弄得影子时而变长时而变短,但竹竿还是那么长,没有变。

股价上涨下跌,反反复复,再加上众多嘴巴的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弄得人心不定、七上八下,弄得手指头禁不住诱惑,追涨杀跌、进进出出。股市由于眼球的力量,仿佛变得比民生还重要?后来弄明白了: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再苦,能比下岗职工苦?虚拟经济再重要,能比实体经济重要?

不光股市,环境似乎也在恶化,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气候恶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似乎一语成谶,悲观主义者颇有先见之明。

但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似乎也没有错,比如说吧,如果乾隆皇帝今天下江南会怎么样呢?先上网搜索,看看哪儿有好玩儿;然后坐空军一号飞上天,一个多小时到上海了,或者乘坐京沪线动车,七八个小时到苏州了;而且有空调,不用在马车里放一盆冰块降温;也许,皇帝还能和英吉利、法兰西的头头脑脑们网上聊天,或者玩儿斗地主、憋七呢。

过去,老百姓揣摩皇帝过的日子,那还不是“天天吃饺子”?说起来,日子还真是越过越好了,现在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比皇帝还好——乐观主义也没有错呀。

石油、煤炭肯定越来越少,但人类会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替代品,至于多长时间才能够找到,那就要看资源的稀缺程度了。稀缺到价格飞涨的时候,全人类都想得撤解决这事儿——太阳能就得到充分利用了,风力发电的大风车可能也会竖起来好多,潮汐能、核能、生物能也都用起来了,废品回收更有效了,循环经济也建起来了。之所以现在还不行,就是因为没被逼到那个份儿上。

和股市差不多,跌得多了,时间长了,就忍不住了,大家伙儿都开始抛,也就离着上涨不远了。

悲观主义看市场,一定是有许多毛病的,风险自然是大大的。这次的跌幅到了20%,与5·30的22%也差不多。这次之所以不那么难受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不像5·30倒栽葱似地往下掉。

乐观主义看市场,就没那么可怕。如果5·30那几天出差了,或者打了几天麻将没看行情,那和您有什么关系?市场的事儿多了,从1929年大崩盘、二战、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1987年大崩盘、9·11、非典,事儿少吗?不过过来了!就说9·11导致美国航空股暴跌,怎么,老百姓还不坐飞机了?暂时可能会不出门,时间长了还不是要买飞机票?非典时候市场暴跌,中国老百姓不出门,不逛商场了,不坐飞机了,可也没见商店黄了,航空公司关门,对不?

等事儿过去了,一切还会恢复过来,因为不管影子怎么变,竹竿还是那么长。万一,哪天太阳没出来,天上压根就看不见影子,也没关系,因为太阳不可能老是歇班,那云彩老加班也不干吗!

乐观主义看市场,贵州茅台(600519)将来必上千元,因为现在是每股180元,差不多是茅台酒的三分之一,将来茅台多少钱一瓶?肯定是上涨啊。

当然了,要看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好酒越存越值钱,可是点心、饮料、鸡蛋就放不住,时间一长就变质了。现在看看市场上的“壳”,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值钱,因为重组中已经开始放弃“壳”了。从中石油的私有化到新钢铁的重组,石油大明、中原油气、攀钢矿业、ST长钢,这些壳呢?丢掉了,直接跟着上市公司注销了。本来炒“壳”,是当乌龟壳炒,因为龟甲还能入药,但现在成了鸡蛋壳了,把鸡蛋磕开,谁还留着壳呢?

没有悲观主义,人类还傻着呢,还不知道要保护环境节能降耗;没有乐观主义,人类早就完蛋了,心里头没盼头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都很重要。市场也是这样,股价再跌,茅台还在上货架,万科还在盖房子,商场里依旧川流不息,竹竿没有变,变的是影子。时间长了,就摸到规律了,反正影子总要变来变去的,由它去吧。

悲观主义让人有危机感,乐观主义让人有方向感,都少不得。